

农
业
研
究

第八集



农业出版社



农 史 研 究

第 八 辑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编

农 史 研 究

第八辑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主编

• • •
责任编辑 段晓东

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区枣营路）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遵化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 9.5印张 212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80 册 定价 4.60 元

ISBN 7-109-00228-4/S·167

目 录

夏纬瑛先生对先秦农史研究的贡献.....	范楚玉 夏经林	(1)
《夏小正》新证.....	李学勤	(4)
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	裘锡圭	(12)
论先秦农史资料的整理和注释问题.....	马宗申	(42)
《吕氏春秋》中的四篇农业论文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石.....	杨直民	(50)
试论《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的时代性.....	李根蟠	(56)
陈旼及其《农书》.....	李长年	(69)
《农桑辑要》——金、元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缪启愉	(77)
试论明清农书及其特点与成就.....	王 达	(89)
关中农学家——杨屾.....	李凤岐	(101)
我国古代的治理盐碱土 技术.....	闵宗殿	(104)
回顾我国近代改进农业跨出的第一步.....	章 楷	(113)
“夏注”习读札记.....	张 波	(119)
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 总结.....	彭世奖	(126)
考古发现和中国生物学知识的 起源.....	苟萃华	(132)
苏颂《本草图经》在生物学的 贡献.....	刘昌芝	(138)
《梦溪笔谈》所载“鳄鱼”、“白雁”考.....	汪子春	(141)
编后语.....		(147)

Contents

Xia Weiying's Contributions to Pre-Qin Agri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Fan Chuyu, Xia Jinlin (1)
A New Certification on "Xia Xiao Zheng"	Li Xueqin (4)
Agriculture in the Shang Dynasty Viewed in the Light of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Qiu Xigui (12)
The Problems in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Pre-Qin period	Ma Zongshen (42)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China Traditional Agriculture—Four Agriculture Treatise in "Lü Shi Chun Qiu"	Yang Zhimin (50)
About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hronology of "Lü Shi Chun Qiu Chang Nong"	Li Genpan (53)
Cheng Fu and His "Nong Shu"	Li Changnian (69)
"Nong Sang Ji Ya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Jin-Yuan Dynasties.....	Miao Qiyu (77)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 of Agricultural Works During the Ming-Qing Dynasties	Wang Da (89)
Agronomist in the Central Shanxi Plain--Yang Shang	Li Fengqi (101)
Technique in Improving Salt-alkaline Earths in Ancient China	Min Zhongdian (104)
First Step of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in Recent China	Zhang Kai (113)
Notes on Books Annotated by Xia Weiying	Zhang Bo (119)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Pollu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Is Worthy to Sum Up	Pen Shijiang (126)
Discoveries in Archaeology and Origin of Biological Knowledge in China.....	Gou Cuihua (132)
The Contributions of Su Song's Works "Ben Cao Tu Jing" in Biology	Liu Changzhi (138)
The Investigation of "Crocodile", "White Wild Goose" Written in	

"Meng Xi Bi Tan" Wang Zichun (141)
Postscript (147)

夏纬瑛先生对先秦农史研究的贡献

范楚玉 夏经林

夏纬瑛先生，河北赵州柏乡人，生于1896年。青年和中年时期致力于植物分类的研究，曾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和北京农业大学生物系、河南大学理学院、西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单位担任过助理员、助教、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植物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收集资料，采集标本，进行植物调查，就成为当时植物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夏纬瑛先生和我国植物学界的其他先行者，在经费不足，交通不便，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的极困难条件下，仍坚持到浙江、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内蒙等省、自治区采集标本，调查植物分布情况。他发表的植物学研究论著先后有：《万生园栽培植物目录》、《鹅耳枥两个新种》、《中国松树新种》、《介绍李善兰》、《中国古代植物分类》、《中国西北黄土高原的几种代表植物》等。

夏纬瑛先生不仅为我国近现代有造诣的植物学研究者之一，而且对中国先秦农史的研究成绩卓著。1955年，他执教于西北农学院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西北工作站主任时，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他被吸收为该室成员之一，和辛树帜、石声汉等农史界老前辈，共同切磋，开展了系统地、科学地整理中国古农学遗产的工作。

根据《史记》和《汉书·艺文志》等的记载，战国时期已有《神农》、《野老》等农书出现，虽然它们很早就已佚失，但有关先秦的农事记载，还是有篇有段，零章散句地分散在各种古文献中，而且数量丰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先秦古书，向称难读。一是这些古代文献距今时间太久远了，文章句法古奥，大不同于今，加之字体的变化和长期的辗转传抄刻印，自然免不了有错误和脱漏之处，因而更不易读通，读懂；二是这些古献中提到的，不论是农业政策，还是农业技术，都和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情况、生产工具、生产实践有关，必须从各方面去理解它。整理这些分散在先秦古籍中的农史资料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夏纬瑛先生就是当前中国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丰硕成果的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

夏纬瑛先生先后研究整理出版了五种有关先秦农史著作，共计三十万余字。

- 一、《管子地员篇校释》 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
- 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 1964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 三、《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 1979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 四、《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 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五、《夏小正经文校释》 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

夏纬瑛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从他研究整理上述五种先秦著作中，可以归纳出几个特点：

一是旁征博引，善于联系。如《夏小正》经文：“来降燕乃睇”句，语义离奇，文句累赘。他撇开历代注家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的连篇累牍的解释，而自己根据《小戴礼记·月令》、《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等书互校，断定“来降”之上脱落“玄鸟”二字，原经文应为“玄鸟来降”；“燕乃睇”三字是小注，即原经文“玄鸟来降”的古老传注。又如《吕氏春秋·辩土》中有“大圳小亩为青鱼肤”，历代注家都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意思，而夏纬瑛先生根据《荀子·荣辱》篇中“鲦体者，浮阳之鱼也，肤于沙而思水，则不逮矣”的话进而联想说：“鱼‘肤于沙’，就是鱼失水而浅着在沙滩上了，故思水，‘则不逮’。今一条亩（田中高出的垄）狭小而两旁的圳（垄间的小沟）宽大，岂不像一条鱼肤在沙滩上的形状吗？”千百年来，这句话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二是独立思考，不拘于前人之说。《管子·地员》篇：“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其立后而手实。”“其立后而手实”六字，以前各种版本都放在“渎田悉涉，五种无不宜”之下，诸家解释也分歧不明。独有章炳麟读“立后”为“粒厚”，“手实”为“垂实”，解释较为合理。但加“粒厚而垂实”于“五种无不宜”之下，又似为赘文。夏纬瑛先生独立思考，不拘于前人之说，仔细琢磨上下文义，发现这里既有错句，又有错字。他正确地指出“立后”是“立名”之误，因“名”字上半字坏而致误的；“手实”系“责实”之误，也是因“责”字坏，上半略似“手”字而致误。他还指出，“名”、“实”相对而言，“立名而责实”是古之成语，它是说明全篇总意的，应当放在“其施七尺”之下。经过这么一番校正错误之后，《地员》篇开头的这几句话就通顺，合情合理了。

三是联系实际，结合实践。对先秦古籍，历代都有人进行研究，但他们把功夫大都花在文字训诂方面。夏纬瑛先生校注整理古籍时，除在文字上下功夫外，还紧紧抓住文献的实际内容，运用他广博的现代生物学和农学知识以及耳闻目见的实践知识来观察解决问题。《诗经·大雅·生民》中的“种之黄茂”、“实方实苞”两句，南宋朱熹解释为种谷要浸种（“此渍其种也”）。夏纬瑛先生指出该诗产地系我国北方，除了种稻谷外，种禾谷是不需要浸种的。这里的“种”说的是选种，“黄（光亮）”、“茂（美好）”、“方（肥大）”、“苞（饱满）”都说的是选种标准，与浸种完全是两回事。又如《周礼·地官》司徒之属官“稻人”的职文中有“凡稼泽，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句，郑司农（众）解释为“夷刈其禾于下种麦也”；郑玄则解释为“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夏纬瑛先生指出，郑司农之说全凭想像，于文义不切，郑玄的说法近是，但还有不符合实际之处。他以自己亲自所见内蒙古五原一带农民在夏天杀草的办法来体会“稻人”职文中所说的“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的意思，说：“他们的办法是在一块高低一致的田地周围，筑成高约三尺的土堰，把渠水放入田，水深约二尺有余，这叫作放伏水。田中的杂草，在夏日三伏天里，经如此浸泡，全然腐烂于田中，而化为肥料。田中的水，经秋而渗入地中，但其地甚湿，至冬而冰凝。明年春天，冰

融，其土甚松，用木犁耕之，播种春小麦。因田中的土疏松而又多含水分，且已无草多肥，故不需耕锄与浇灌施肥，直获丰收。我的体会，以为‘稻人’职文所言的，‘夏以水殄草’，就是这类的除草方法。这种除草的方法甚为有效。”

夏纬瑛先生以全付精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采经摭传，集句寻篇，对诘屈聱牙的古文辞，考证年代，辨别错简，改正误字。先从一字一句地旁征博引，探求本义，然后根据上下文通篇大义进行论订。上述三十余万字著作，实比一般的学术著作要花费双倍甚至数倍的时间和心血。这些著作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和农史学界的重视。如《管子地员篇校释》中的许多论点，郭沫若先生将之收入了《管子集校》一书中；日本出版的《中国农业经济史》一书则全文刊载了。夏纬瑛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先秦农业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给先秦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夏小正》新证

李学勤

《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这段著名的话，传统上都在“之”字下点句。但也有学者主张在“言”字下点句，读为：“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①这样，就可以看出它和《礼记·礼运》所记相近。《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这里的“之”都是动词，是“往”的意思。《八佾》和《礼运》两段话，很可能是同源而传闻异辞。《夏时》即《夏小正》，司马迁已讲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②因而郑玄注《礼运》，也说：“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可见从晚周到汉代，人们都认为《夏小正》确与夏代有关。学者认为《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③，是合乎实际的。

正因为《夏小正》渊源久远，历代有很多学者潜心研究。近年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加以系统考察的，以夏纬瑛先生贡献最多，他的著作，如《夏小正经文校释》、和与范楚玉同志合著的《“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④，均有较大影响。《夏小正》一篇，特别是经文部分，文辞古奥简约，相当难解，对其年代更有不少争论。本文利用考古学包括古文字学的一些成果，对《夏小正》经传的若干问题试作讨论，请读者指正。

（一）雉震响：

《夏小正》经文正月云：“雉震响。”传言：“震也者，鸣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响”字，《说文》作“雊”，云：“雄雉鸣也。雷始动，雉乃鸣而句其颈。”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依《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所引，校正《夏小正》此段为：“雷震雉雊。雊也者，鸣鼓其翼也……”这样，《说文》的训解恰是根据《夏小正》。

需要说明的是，《说文》以“雊”为“雄雉鸣”，另有“鶗”字训为“雌雉鸣”。段注已解释，这是出于《诗·小弁》、《匏有苦叶》两篇的训诂，实际两字“浑言不别”，可相通用。

以雉鸣为物候的观念流传很久，段玉裁已引到《礼记·月令》、《洪范五行传》和《易》纬《通卦验》等书，都有类似《夏小正》的记述。后两种书属于占候，可知在古人心目中每年到一定时令应有雉鸣，反过来说，应鸣而不鸣，不应鸣而鸣，都会被认为灾

异。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有以雉鸣为灾异的记事，例如《核斋甲骨展览》21胛骨：

“……之日夕山（有）鸣雉。”

《殷虚文字缀合》36胛骨：

“〔癸丑卜〕永〔贞〕，旬亡〔祸〕。……乙卯山（有）设，……象庚申亦山（有）设，山（有）鸣雉，狩圉羌或。”^⑤

两版均为武丁时的宾组卜辞，“雉”字作鸟形，横贯一笔，和甲骨文“彘”字可写成“豕”字横贯一笔结构相似。

这两条卜辞只记“有鸣雉”，没有标明雉鸣的环境地点，所以雉鸣成为灾异只能是非时而鸣。前一条雉鸣在“夕”即晚间，更是不应鸣而鸣的显例。

《尚书·高宗肜日》云：“高宗肜日，越有雊雉。”以雉鸣为异象，与上引卜辞相同。《高宗肜日》这一篇，《书序》、《尚书大传》、《史记》等都认为是记武丁时事，也正和上面卜辞同时。王国维则以为武丁之子祖庚时事，理由是卜辞金文中凡言某某肜日是指所祭之人^⑥。按现已发现的卜辞金文，或作“王宾某某肜日”，或作“遘于某某肜日”，与“高宗肜日”不完全相合，同时也没有出现“高宗”的称呼，用来推断“高宗”不是主词，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至于《尚书大传》和《史记·殷本纪》说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是汉代经说，是否符合《高宗肜日》本义，则是另一问题。

总之，以雉鸣作为物候，并以雉非时而鸣为异变，在商代业已存在，可以视为《夏小正》的旁证。

（二）夏有煮祭：

《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传云：“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时也。”这一段中“夏有煮祭”不易解释，前人大多不加说明。王聘珍说：“《尔雅》曰：‘夏，大也。’《说文》云：‘煮，享也。’谓大烹而祭也。”^⑦可备参考。

按各种礼书讲祭祀，罕见用“煮”。“煮”用于祭祀，见于商代金文。四祀邲其卣铭文的前半是：

“乙巳，王曰：‘樽文武帝乙宜。’在邲大庭，遘乙翼曰。丙午，魯；丁未，煮。……”^⑧

四祀邲其卣是商代最后一王帝辛——商纣王在位第四年时铸作的酒器。铭文记帝辛尊宜于其先父帝乙，“尊宜”是一种祭祀，在邲地的大庭举行。次日丙午“鲁”，此字《说文》云读若“写”，“写”的意思是将食物自一器倾入他器。再次日丁未“煮”，“煮”的意思是“享”，也就是献。《说文》段注指出，“享”在这里意味着“煮而献之上帝鬼神”。卣铭所说尊宜、写、煮，是一次祭祀的具体步骤^⑨。这一铭文说明商代祭祀有“煮”，可和《夏小正》参照。

王聘珍说《夏小正》传文“夏”训为“大”，那么“夏有煮祭”便是大有煮祭，这是

不够通顺的。“夏”还是作夏季解。传文是说到夏季要举行煮祭，要用羔羊。二月羔羊刚刚离乳，可以帮助母羊饲养，所以传云“善羔之为生也而记之”。这种羔羊，是为夏天的煮祭准备的。四祀邲其卣的“煮”，是在四月。我们认为商代是有四时的^⑩，如果当时历法以四、五、六三月为夏，正与“夏有煮祭”一致。不过，传文作于周代，礼制不一定与商代相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丁亥者，吉日也：

经文二月：“丁亥，万用入学。”传云：“丁亥者，吉日也。”研究金文的学者早已发现，铭文用丁亥日的最多^⑪。一九七八年，黄然伟氏曾统计商周有干支纪日的金文和其中有关赏赐的铭文，结果证明“‘丁亥’之用，自西周以迄东周，出现于铭文之次数最多，且至东周之时，有绝对多数之趋势。”^⑫他还引用《仪礼·少牢馈食礼》筮日辞和《夏小正》本段，证明古人取丁亥之日祭祀和入学习舞。

金文为什么多用丁亥日？黄氏认为：“此‘丁亥’之日，当为古人所以为最吉善之一日。”^⑬这与《夏小正》是符合的。但黄氏把丁亥都列为“诹日”（选择日期）的实例，即金文中的丁亥均为实有的干支，很难说明东周金文丁亥日占绝对多数的现象。庞朴同志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主张金文的丁亥和《夏小正》、《少牢馈食礼》的丁亥一样，都是虚拟的吉日^⑭，这显然更为合理。

不了解丁亥，特别是东周金文多见的“惟王正月初吉丁亥”是虚拟的，会给青铜器的断代研究带来不正确的推论。这些历朔，事实上不能据以推算器物的年代^⑮。

丁亥为什么被认为吉日，这一点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可以确定的是，这一观念与古代的阴阳说有关。《礼记·曲礼上》云：“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表记》也说：“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郑玄注《曲礼》云，刚日“顺其出为阳也”，柔日“顺其居内为阴”。自甲至癸十日，甲、丙、戊、庚、壬五奇为刚，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祭祀、入学之类都属于内事，应该以柔日为吉，丁亥大约就是柔日中最吉利的一天。

刚日、柔日之说，还可从商周金文的日名得到印证。大家知道，商人常以日干为庙号，如祖甲、妣乙、父丙、母丁等等，这种习惯延续到西周。张光直先生曾取1295件青铜器的这种庙号进行统计，结果十干的分布是：

甲：	30件
乙：	274件
丙：	21件
丁：	270件
戊：	55件
己：	178件
庚：	41件
辛：	209件
壬：	14件
癸：	203件” ^⑯

刚日、柔日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庙号和祭祀的用日是直接联系的，祭祀用柔日为好，从而庙号也多采用柔日。

(四) 剥蠶：

二月经文云：“剥蠶。”传云：“以为鼓也。”“蠶”即“鼉”字，鼉即今天说的扬子鳄^⑩。

“鼉”字据《说文》从“单”声。殷墟甲骨卜辞已有此字，从“单”省声。有学者认为字上面两圈形象鳄的双眼或鼻孔，恐怕是不对的。卜辞“鼉”字，见孙海波《甲骨文编》第1582字、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第245页。不过卜辞此字似均非动物名，如《殷虚书契后编》下33,11、《殷虚书契续编》5,27,5、《簠室殷契征文》典104三片武丁卜辞，都有“不鼉其卫”的话，“鼉”字用为动词或形容词。虽然如此，卜辞既有该字，说明商代人们对这种动物已有相当认识。

商代青铜器上曾出现鼉的形象，并有用青铜仿制的鼉鼓^⑪。后者现在日本泉屋博物馆，蒙馆长樋口隆康教授协助，我们曾作仔细观察。三十年代，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217号大墓中曾发现木身鼉鼓的实物^⑫。由此证明，商代已有剥鼉为鼓的行为。

近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群中，发现了年代更早的鼉鼓。据报导，“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磬、陶异形器（土鼓？）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鼓身皆作竖立桶形，当为树干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已朽，但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之可证原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鼉鼓无疑。”^⑬简报已指出，陶寺位于晋西南夏墟范围内，当地鼉鼓的发现，正可与《夏小正》的记载印证^⑭。

(五) 盖大正所取法也：

四月经文云：“初昏，南门正。”传言：“南门者，星也。岁再见，壹正，盖大正所取法也。”“大正”一词，前人有种种解说，最详细的如洪颐煊《夏小正疏义》以为“古刑官名”，现在看来仍不准确。

洪氏之说系以《逸周书·尝麦》为依据。《尝麦》篇一开头就说：“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大祖。是月，王命大正正刑书。”篇中还有不少语句提到大正。注解者见大正受命正刑书，也多以为刑官，如朱右曾云：“大正，盖司寇也。”^⑮然而，篇中正刑书的大正可能是司寇，并不等于所有大正都是司寇。

西周金文屡见“大正”，有的写作“大政”，例如：班簋铭有“惟作邵考爽益曰大政。”^⑯梁其钟铭有“邦君大正用天子宠，蔑梁其辱。”^⑰一九八〇年河南临汝朝川出土的一件匱，铭为：

“盥公大正叔良父作淳匱，其眉寿万年，子子孙永宝用。”^⑱

这些“大正（政）”都是官名。时代略晚的邾君钟（《三代吉金文存》1,8,1）也有“大正”一词。

按此词见于《左传》，如成公六年：“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昭公七年：“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孙伯麌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杨树达、杨伯峻先生先后讨论，认为“大政”义为执政大臣，同于“正卿”^⑲。

这和梁其钟铭“大正”在天子、邦君之下相符。《尝麦》和《夏小正》的“大正”也应这样解释。

(六) 执陟攻驹：

《夏小正》经文四月：“执陟攻驹。”传云：“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者，离之去母也。陟，升也，执而升之君也。攻驹也者，教之服车数舍之也。”前人多以为“陟”当读为“骘”，即牡马，并以《月令》“絷腾驹”、《淮南子·时则》“执腾驹”为证^②，是正确的。

《周礼·校人》有“春祭马祖，执驹。”注：“郑司农云：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二岁曰驹，三岁曰駔。玄谓：执，犹拘也。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匹伤之。”这里说的“执驹”，和《夏小正》的“执陟攻驹”颇相类似。《周礼·庾人》则有“执驹”和“攻驹”二事，注云：“攻驹，驅其躋齧者。”郑玄所讲的“驅”，就是骟马，和《校人》注先郑说不同^③。《夏小正》传所说“执驹”与先郑说一致，“攻驹”则接近《庾人》的“教駔”，不是骟马。

一九五五年，陕西郿县李村出土青铜器一组，内有驹尊一件，驹胸及器盖内均有铭文^④。胸铭有：

“惟王十又二月辰在甲申，王初执驹于巂。王呼师虞召盞。王亲告（遂，读为绥）盞马。……”

盖铭有“王拘驹厚”，尊腹内取出的另一器盖，铭有“王拘驹巂”，“巂”和“厚”都是地名。材料发表后，我们曾引用《夏小正》、《周礼》加以说明^⑤，杨向奎先生也撰有很详尽的论述^⑥。驹尊象小马形，两盖铭分别记“骓子”、“駔子”，“骓”、“駔”指驹母而言，证明“执驹”或“拘驹”是使小马和母马分离，合于《夏小正》传及郑众之说。

有学者指出，郿县李村靠近汧、渭二水交会处，而汧、渭之间是周孝王命秦的祖先非子主持养马的地区^⑦。盞的年代要更早一些^⑧，可见“执驹”的起源是很早的。

(七) 陟玄鸟蟄：

经文九月“陟玄鸟蟄”，传言：“陟，升也。玄鸟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后言蟄，何也？陟而后蟄也。”按《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仲秋纪》都说仲秋之月“玄鸟归”，高诱注《吕》书云：“玄鸟，燕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归蟄所也。”郑玄注《月令》也说：“玄鸟，燕也。归，谓去蟄也。”他们都显然受到《夏小正》的影响。《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语，有“玄鸟氏，司分者也。”杜预注：“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这里郯子是追述他先祖少皞时的故事，可以说明燕称玄鸟，并作为一种物候，是起源很早的。《诗·高风》有《玄鸟》篇，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也见于《楚辞》等书，是玄鸟一名起源甚古的又一证据。

很多著作认为在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玄鸟”，最近一篇有关论文说：在著名的晚商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玄字作‘𠁵’，金文习见，右侧之鸟呈双翅展飞状。”^⑨所讲的壶实际是一件方罍，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19,14，拓本可看《三代吉金文存》12,2,1，照片见《商周彝器通考》788。孙稚雏同志

《金文著录简目》已将器名纠正了^⑨。

这件方罍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入《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要览》^⑩。一九八五年冬，我访问该研究所，作过观察。罍已失盖，器高28.2厘米，通体黝黑，呈所谓“熟坑”状。高口缘外饰象鼻夔纹，肩饰鸟首夔纹，腹上部有饕餮纹带，下为垂叶纹，内有由相对两夔合成的饕餮纹，圈足饰云纹。肩两侧有饰兽首的小环耳，耳内器壁上各有“亚戈”二字。大家说的“玄鸟”铭文，则在口沿内壁。

这里提到的“玄鸟”铭文，应该怎样释读，学者间见解不一。例如罗振玉所编《三代吉金文存》，称此器为“鵱妇壺”，以“玄鸟”为一字。容庚先生三十年代在《燕京学报》发表《鸟书考》，曾以为“玄”字加以鸟形装饰，是鸟书的起源，但到六十年代重写该文，则未再言及^⑪。我们认为方罍铭应合读为“亚戈，鵱妇”，“亚戈”是族氏，“鵱妇”是器主。青铜器所见某妇，如“陆妇”等，意思是某人之妇，所以“鵱”应当是一个字。从字的结构是“幺”在鸟喙下看，也当是一个字，只是“鸟”写得比较象形罢了，而这正是当时字数较少的铭文的通例。甲骨卜辞“兹用”，有时省成“幺用”，因而“鵱”很可能就是“鵱”字。“鵱”字在青铜器铭文中也出现过^⑫。这样看来，青铜器铭文中并未出现“玄鸟”一词。

(八) 善人不从：

十一月经文：“善人不从”。传只说：“不从者，弗行”，对“善人”未作说明，以致后世注家议论纷纷。有的学者不承认“善人”是一名词，如王聘珍云：“善者，省也。善人，谓省啬徒众也。不从，谓不从王狩也。”^⑬这是由上文“王狩”、“陈筋革”，传言：“陈筋革者，省兵甲也”，引申而得。但省人只能说简从，不好说成“不从”，自语法角度法是不够通顺的。较多的学者还是以“善人”为名词，如洪颐煊说：“善人，谓农人也。《说文》云‘田夫谓之善夫’，《大戴礼·四代》云‘善民执功’，皆谓农人也。”^⑭这比王说要好得多。洪氏以“善人”和“善夫”联系是对的，可是如果是指农人而言，冬季狩猎，农人正值空闲，应该能够从王，何以反而不从，未免费解。

我们认为，这里的“善人”可能相当于文献中常见的“善夫”，是指有一定地位的官吏。前人对“善夫”作过许多研究，近年由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其中有很多“善夫”，更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论作。其中裘锡圭同志的《善夫初探》，征引大量材料，最为博瞻^⑮。

睡虎地秦简注释提到：“县及县以下地方行政机构及都官的负责人都可称善夫。”^⑯裘文意见略有不同，但也说“善夫”在秦由基层治民官吏的称呼，发展为不同级别的治民和治事的长官的通称。我们觉得，通观文献和出土材料的“善夫”，这个词不是一个具体官名，而是比较低的某一范围内官吏的通名，在这一范围内的官吏本有官名，同时可称“善夫”，就像现在我们把各机构的“长”都叫做“负责人”一样。至于“善夫”适用的范围，各时期和地区可能互有不同，需要进一步分析。

“善夫”一词最早见于《夏书》。《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善夫驰，庶人走。”此文也见于今本《尚书·胤征》。“善夫”与“庶人”对

举，释为官吏通名也是合适的。《夏小正》所谓“啬人不从”，可能就是说官吏不必随从的意思。

本文所论各点，表明《夏小正》确实有古老的渊源，其经文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晚到战国时期。希望这些讨论能引起大家对《夏小正》的更大重视。

注：

- ①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五。
- ② 《史记·夏本纪》
- ③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73页。
- ④ 夏纬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农业史上的意义》，《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 ⑤ 参看齐文心《殷代的奴隶监狱和奴隶暴动》，《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
- ⑥ 王国维《高宗肜日说》，《观堂集林》卷一。参看刘起釪《谈“高宗肜日”》，《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⑦ 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二。
- ⑧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275；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青铜器(上)67。
- ⑨ 李学勤《郊其三亩与有关问题》，《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 ⑩ 同上《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 ⑪ 王国维《齐国差籍跋》，《观堂集林》卷十八。
- ⑫ 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第二章，第69页。
- ⑬ 同上，第71页。
- ⑭ 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 ⑮ 参看李学勤《晋公盘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
- ⑯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八《谈王亥与伊尹的祭日并再论殷商王制》。
- ⑰ 参看徐钦琦、黄祝坚《试论晚白垩世以来气候、地理等因素的变化对冕类的进化及地理分布等影响》，《古脊椎动物学报》第22卷第1期。
- ⑱、⑲ 周本雄《山东兗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 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 ㉑ 参看黄祝坚、李学勤《中国考古和古代文献中的扬子鳄》(待刊稿)。
- ㉒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六。
- ㉓ 参看李学勤《班簋续考》，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
- ㉔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3。
- ㉕ 临汝县文化馆《河南临汝县出土西周铜匣》，《考古》1984年第2期。按“淳”训为“沃”即浇注。
- ㉖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第830页。
- ㉗ 洪颐煊《夏小正疏义》。
- ㉘ 孙颐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二。
- ㉙ 李长庆、田野《祖国历史文物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
- ㉚ 李学勤《郿县李家村铜器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7期。
- ㉛ 杨向奎《释执驹》，《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 ② 卢连成《序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 ③ 李学勤《穆公簋盖在青铜器分期上的意义》，《文博》1984年第2期。
- ④ 马世之《商族图腾崇拜及其名称的由来》，《殷都学刊》1986年第1期。
- ⑤ 孙稚维《金文著录简目》第294页。
- ⑥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要览》图版第46页31；又，《中国古代青铜器展观》图版第一，四、图版第四，四。
- ⑦ 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 ⑧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4页。
- ⑨ 同⑦。
- ⑩ 同⑨。
- ⑪ 见《云梦秦简研究》。
- ⑫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注②。